

讀了日記之後

張力

台灣“中央研究院”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

小學四年級的國語課本中就有一篇介紹西安事變的課文，文中提到張學良劫持了蔣介石，但稍後讀了蔣的日記，內心感動而悔悟，於是就釋放了蔣介石。這是我們從小就知道的西安事變官方說法。

二十歲以前，蔣介石和我之間的距離似乎非常接近，但實際上極其遙遠。從懂事的時候起，我記得家裏高掛一幀蔣介石送給父親的半身戎裝脫帽照片，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沒有頭髮，軍服的領口上有五顆星。我家先後住過台灣左營三個不同的海軍眷村，每次搬家之後，這幀照片必定掛在新家客廳最醒目的位置。後來我去鄰居或別的村子同學家，也常常在客廳中看到同樣的照片，上款寫着“××同志”，下款則是“蔣中正”簽名。所以不只我家有這種照片，許多人家裏都有。此外，有時軍方會在年底送給每家眷戶新年度的日曆，日曆硬紙板上常是一幀蔣介石視察艦隊的照片，我們每天撕掉一張日曆，也就日復一日跟他對望了一整年。

不僅如此，戰後台灣生長的一代在日常生活中，也經常接觸到“蔣總統”的消息。學生唱着崇拜他的歌曲，稱他是“大革命的導師”、“大時代的舵手”，高呼“蔣總統萬歲”，甚至聽別人說到“蔣總統”三個字，就要立正。

蔣介石到台灣的前二十年間，身體狀況還不錯時，我們可以在特定節日聽到收音機裏傳來他宣讀文告的濃濃浙江口音。由此看來，我們太容易接觸到蔣介石了。可是我們同齡的人少有機會親眼見到他，我就從來沒有，即使在慶典場合隔着人群遙望他的機會也不曾有過，所以有時我竟會懷疑他可能不是和我處在同一時空之中。

那個時候，“偉人”形象還可以透過教育體系來塑造。通過學校的教科書就是一種途徑，有幾冊中小學語文課本選錄了他署名撰寫或是正面描述他的文章。小學四年級的國語課本中就有一篇介紹西安事變的課文，文中提到張學良劫持了蔣介石，但稍後讀了蔣的日記，內心感動而悔悟，於是就釋放了蔣介石。這是我們從小就知道的西安事變官方說法。直到我念了研究所，經常刺激我們重新思考歷史的李定一教授，有一次就挑戰了西安事變的說法。他說：“如果真有日記，為何不公佈出來，讓大家都能讀到，和張學良一樣感動？”此後我就常常想着蔣介石到底有沒有日記、官方說法是不是可信等問題。事隔三十年，蔣介石的日記竟然真的出現了，而且數量龐大。已經辭世的李老師如果仍然健在，必定有興趣一睹日記內容，看看會不會令他也感動。

來到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檔案館閱讀蔣介石的日記，終於讓我有了一種真正接近蔣介石的感覺。我在 2009 年獲得胡佛檔案館的邀請，於 9 月 23 日抵達斯坦福大學，直到 11 月 1 日返台。我和所有先後從各地來的學者、學生一樣，得到郭岱君、林孝庭、房國穎等胡佛同仁熱情的接待與協助。那段時間還有戴鴻超、張淑雅、陳謙平、陳立文、段瑞聰、羅敏、李玉、楊子震，以及鹿錫俊夫婦等師友，大家互相幫忙，彼此照應，也不時聚餐討論搜集資料的心得，想必都留下了美好的回憶。

當時胡佛檔案館已經開放了所有蔣介石的日記，我停留的時間不長，且在檔案館中還要查閱其他人物的檔案，因此日記內容的選取，只集中在 1942

年的浙贛會戰、1946 年的巴黎和平會議與 20 世紀 40 年代有關海軍、中美合作所等的記載。從自己搜集的日記資料的經驗，和其他學者對於日記內容的解讀，我有一些不成熟的心得，在此作一野人獻曝的分享。

日記中與浙贛會戰有關的記載，是我最先注意搜集者。當時在哈佛大學訪問的浙江大學陳紅民教授，正在籌備於 2010 年 4 月在杭州召開“蔣介石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”，我亦受邀撰寫論文。由於我是自 1942 年的日記開始閱讀，讀了不久，就接觸到浙贛會戰的相關內容，所以就以蔣介石與浙贛會戰的關係為探討對象，最後提交的論文題目是《從決戰到棄守：浙贛會戰衢州戰役蔣介石的抉擇》。

眾所皆知，蔣介石日記的內容只能抄錄，不能複印或拍照。這項規定對早已習慣在圖書館、檔案館抄寫資料的人來說，並不構成困擾，摘錄資料原本可以加深印象，同時促進思考。我掌握了所有的日記內容（與衢州戰役有關的記載），並以此為基礎完成初稿。回到台北後，我又查閱其他相關的資料，如“國史館”典藏的蔣介石檔案和已出版的《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》，發現所有抄錄的日記內容，竟然均可在台北已開放或已出版的史料中找到，心中不免稍有失落。

有關 1946 年巴黎和會的研究，自己原已進行若干時日，且從台北已出版和未出版檔案中搜集到不少資料。我閱讀日記時，所掌握到的蔣介石對中國參加和會的初步態度，也都可從其他史料有一了解。不過我所關切的問題，是當時蘇聯對中國並不友善，先是阻撓中國參加巴黎和會不成，後來不同意中國同列為和會召集國之一。蔣介石的日記中詳細記載了他與幕僚對於是否參加和會的思考，最重要的是他最後約見幾位核心幕僚，眾人表示“俄國雖反對我為邀請國，而仍提我為主席團之一，是其對我未為異也”（蔣介石日記，1946 年 7 月 13 日）。他們的提醒促成了蔣介石決定中國要派代表參加巴

黎和會，這是別處未曾看到，而出自日記的關鍵線索。

因此，調閱蔣介石日記之前，如能先行掌握已開放和已出版的史料，會有相當的幫助。但是能够從日記之中讀到別處找不到的關鍵性記載，更有着撥雲見日的驚喜。

蔣介石日記與檔案的開放，帶來一股研究民國史的熱潮，也出現了一些以蔣介石為題的研討會或學術活動。史料刊佈之後，研究者各取所需，並進行各自的解讀。但若僅憑片斷材料解讀蔣介石，結論恐怕容易下得過早。最近有學者讀了由王宇高、王宇正從蔣介石日記中纂輯整理而成的《五記》（即《蔣中正總統五記》，包括《困勉記》、《省克記》、《學記》、《愛記》、《游記》），發現 1923 年 10 月 10 日，蔣介石在莫斯科與留俄中國學生慶祝雙十節時進行演講，10 月 11 日日記中有他遭到批判的記載：“聞有人以弟昨日演說為崇拜個人之弊……而不願尊重國內英雄。”該學者比對了《困勉記》10 日、11 日合為一條的記載後，認為“蔣中正本來自視‘國內英雄’之記述，則被更易為‘祖國領袖’”。所謂“自視”，應為“自己認為自己是”之意，我們未能讀到蔣介石 10 月 10 日演講的全部內容，僅依日記和《困勉記》的現有內容，其實很難判定“國內英雄”和“祖國領袖”說的就是蔣介石自己。當時他只不過是大本營參謀長，恐怕還不會“自視”為“國內英雄”和“祖國領袖”。我則以為蔣是用這兩個稱號介紹總理孫文，致使聽眾認為他是在鼓吹個人崇拜。另一個證據則是，《困勉記》1923 年 12 月 13 日記，留俄學生勸蔣介石加入共產黨，蔣表示“此須請命我總理”，因而被留俄學生譏為“忠臣”，看來蔣介石更不可能以“祖國領袖”自居。

該學者還認為《困勉記》的編輯，刪汰了蔣介石“批判自身黨人之語”和“對蘇聯黨人有同樣作風之憂慮”，進而認為“蔣中正對蘇聯共產黨多少有所同情關懷之意向，在後世製作之文字紀錄裏，不可留下任何痕跡”。是否真

有一些“不可留下痕跡”之刪汰原則，我們並不知道。但從《五記》之中，還是可以發現蔣介石同情關懷蘇聯的記載。《愛記》之中記其遊俄期間，觀察到彼得格列市況蕭條，民氣頹喪，海軍人員神態不良，不免“深為蘇俄憂之！”訪問結束返國之前，蔣介石對俄國有一總體評論，也使他發出“吾尤為蘇俄憂矣”的感歎。不僅如此，《五記》似也保留了一些蔣介石對蘇聯和馬克思主義亦有正面印象的記載。如：《困勉記》1923年9月7日有“訪共產黨秘書長羅素達克，談蘇俄革命歷史，退而記其成功之點與缺點及其現況，以備參考”。9月17日“視察步兵團，退又記其優點”。9月23日參觀高級射擊學校後，記曰“俄國武器之研究及進步，可與歐美各國相競，非若我國之窳敗也”。以及《學記》1923年記其遊俄期間，“看馬克思學說，自記曰：‘看其上半部，頗厭倦欲中輒，至下半部，則覺亦有至理。’”

我甚至認為，日記中出現誤記，也是在所難免。我們若不經考證，就把誤記的內容當作最終證據，恐怕會得出錯誤的結論。1965年8月6日凌晨，國共之間發生“八六”海戰，台灣之“章江”、“劍門”軍艦被擊沉，損失慘重。當日蔣介石的日記提到，他在上午十時主持作戰會談完畢，聽取海軍總司令劉廣凱報告說：今晨在東山西南角章江和劍門兩艦與共方快艇接戰，章江電信已不通，劍門猶可通電，“而我空海偵查，海上有一艘小艇進擊兩艘大艦，因黎總長預令空軍不得其命令，不准轟炸，故未能對小艇投彈。”聽了劉廣凱的報告，蔣介石認為這艘小艇就是中共的魚雷快艇，“如我空軍當時對此艇投彈，至少可阻止其向我艦追擊，則我兩艦自可得救安全，而黎竟限制其轟炸，殊為痛心。”次日得知兩艦均告沉沒，蔣甚為忿悶，憂慮劉廣凱無知無能，不能再負反攻復國之重任，也對參謀總長黎玉璽推薦劉廣凱任海軍總司令，深感痛心。“又思兩艦官兵犧牲者在五百人以上，皆為十年來儲訓難得之人員，又不知如何慰靈矣。”

沉沒之兩艦編制官兵員額數，劍門為一百二十四人、章江為八十一人，合計兩百多人，不知蔣介石為何會記成“犧牲者五百人以上”？不過在 8 月 13 日他記道“一百七十餘將士壯烈犧牲”，在當時他還不知有人被共方俘虜時，是比較合理的推算，但他並沒有因此而修改 8 月 6 日所記超過五百人的數字。

至於令他深感痛心的黎玉璽限制空軍轟炸之命令，是否確有其事？就海上接戰來說，多艘小艇圍攻一兩艘大艦的狼群戰術，確有可能，而一艘小艇追擊兩艘大艦，顯得不可思議，因為兩大艦集中火力，不難擊沉小艇。劉廣凱在其回憶錄《劉廣凱將軍報國憶往》之中，提到 8 月 6 日在陽明山向蔣介石報告章江艦恐已沉沒，劍門於清晨五點鐘之電報中稱準備再戰。蔣介石聽完報告，很久不語，最後才講“希速徹底查明據報”。另據劉廣凱赴陽明山晉見蔣介石以前，先在海軍總部向他報告戰況的海軍總部作戰組副組長徐學海的口述，則是劍門艦接戰後，徐學海向空軍請求派機支持，但空軍作戰司令部因事前不知海軍有此任務，並未立即行動。劉廣凱則記道，空軍飛機是在 8 月 6 日上午七時左右，在兄弟嶼東南 13 海里處發現不明目標三個，以高速向西航行，但並未攻擊。軍機所看到的，顯然是戰役結束後返航的中共魚雷快艇。

將同一場景不同參與者留下的史料進行比對，我認為蔣介石日記中對於此一事件的記載並不合理，但我並不清楚他為何會這麼記錄。我想他可能是誤記，或許其後不久他就有了新的了解，也未懲處黎玉璽。對於過去的誤記，他並沒有修改，這也是一般人寫日記常有的情況。不過我們應用日記作為史料時，卻不能不審慎以對。

總之，讀了日記之後，確實會有不同層面的收穫，包括自己研究的突破、其他學者解讀的商榷，與應用史學方法判別記載內容真確與否。對我個人而言，更是對過去既親近又遙遠的蔣介石，有了新的認識與理解，這樣的認識與理解，恐怕還要在我的研究生涯中持續好幾年。

走近蔣介石

蔣介石日記探秘

宋曹剛璇
郭岱君
編

走向、走近與走進——記一場蔣日記的心靈饗宴 / (台灣) 陳立文	〇九五
美西訪學記 / 郭雙林	一〇〇
在胡佛“聽”和“讀” / 張瑾	一一一
在胡佛的日子 / (香港) 鄭會欣	一二一
從檔案學角度看蔣介石日記 / 方新德	一二七
蔣介石日記——2009年夏之回憶 / (日) 岩谷將	一三五
我們這一班 / (台灣) 黃自進	一三九
最人性化的檔案館——記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之旅 / (台灣) 林桷法	一四三
胡佛檔案館 / (美) 齊錫生	一四六
岳父引我去胡佛讀日記 / (英) 賴小剛	一五七
胡佛查檔趣聞 / 馬振犡	一六三
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之旅 / 蔣耘	一七四
海外訪檔記 / 楊智友	一八二
平生第一抄 / 陳廷湘	一九三
雪球·雪花·雪恥——在斯坦福大學讀蔣介石日記 / 孫江	二〇三

責任編輯：張利方
裝幀設計：李婧琳
排 版：陳美連
印 務：林佳年

走近蒋介石

主編

宋曹珊瑚 郭岱君

出版

中華書局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香港北角英皇道 499 號北角工業大廈一樓 B
電話 : (852) 2137 2338 傳真 : (852) 2713 8202
電子郵件 : info@chunglwabook.com.hk
網址 : <http://www.chunglwabook.com.hk>

执行

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

香港新界大埔汀腺路 36 號

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3 字樓

電話：(852) 2150 2100 傳真：(852) 2407 3062
電子郵件：info@suplogistics.com.hk

1

印風

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

香港觀塘榮業街 6 號 海濱工業大廈 4 樓 A 室

1

版次

2016年7月初版

© 2016 中銀地產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1

規範

16 間 (230 mm × 170 mm)

1

□

ISBN · 978-300-07420-1-1